

春秋哲學

主編 周立升 副主編 王德敏



山東大學出版社

春秋哲學

主 编 周立升

副主编 王德敏

山东大学出版社

春 秋 哲 学

主 编 周立升

副主编 王德敏

*

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安丘一中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13.5 字数 345千字

1989年11月第1版 1989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7—5607—0328—3/B·25

定价：2.85元

编 者 的 话

中国哲学以其悠久的历史、宏富的内容、卓异的风姿而著称于世。它对人类的进步和文明的发展，做出了自己卓越的贡献。

今天，伟大的祖国正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上，迈向新的纪元。清理古代的哲学遗产，揭示中国哲学的发展规律，剔除其糟粕，吸取其精华，建设中国的现代文化，是当代学人的光荣任务。

我们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对春秋时期哲学发展的轨迹加以勾勒和描绘，以便给人以整体的印象。春秋时期是一个光辉的时代。它是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哲学的定型期，标志着中国哲学已趋于成熟；也是“百家争鸣”的开创期，举凡先秦的主要学派，其先驱或创始者几乎都已涌现出来。他们围绕着天人、礼法、和同、名实、义利、古今等问题，抒发己见，治其方术，形成了不同的学术流派和思潮，成为后来学术发展的重要源头。历史的进程并不象某些公式那样死板和呆滞，历史是千姿百态的。不同的学派或同一学派的不同思想家，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其思想也在不断地变化。必须尊重历史的辩证法，按逻辑与历史统一的原则，去再现春秋时代学术思想发展的热烈场面和本来面貌。但是，由于我们受水平的限制，该书许多地方不能尽人如意。不足之处，希望读者予以批评指正。

参加本书写作的同志（按姓氏笔画为）有：

丁原明

第八章

王德敏	第一章第一节 第三章
汪建	绪论二
周立升	绪论一 第一章第二节 第二章 第七章
林永光	第十一章
高晨阳	第五章 第六章
蔡德贵	第四章 第十章
颜丙昱	第九章

在写作过程中，我们吸取了学术界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出于行文的原因，书中并未注明。我们深知，没有这些研究成果作基础，本书是无从编写的，在此我们表示由衷的感谢。

编者 一九八八年九月十日

目 录

绪 论	(1)
一、思想进程与历史发展的统一问题	(1)
二、春秋时期理论思维方式的定型	(10)
第一章 阴阳、五行思想在春秋时期的演变	(24)
第一节 春秋时期阴阳思想的深化	(24)
一、原始阴阳观念的产生和发展	(24)
二、春秋时期阴阳范畴的形成和应用	(29)
三、春秋时期阴阳观念在理论上的深化	(31)
第二节 春秋时期五行观念的沿革	(38)
一、原始五行说的产生与发展	(38)
二、春秋时期五行说的拓展与升华	(41)
三、对春秋时期五行说的反思	(48)
第二章 从原始筮占到春秋时期的《易象》说	(54)
第一节 契数与《周易》	(54)
一、数字刻划图文与原始筮占	(54)
二、三代契数卦与《周易》的定型	(60)
第二节 春秋易象说	(75)
一、春秋易象的基原性	(75)
二、对卦画结构的运用	(80)
第三节 对春秋易象的反思	(91)
一、生动的直觉思维	(92)
二、深沉的理性之光	(95)

三、符、象、意的辩证发展·····	(99)
第三章 管仲的哲学思想	
——管学的开创者·····	(102)
第一节 万物相联的天人观·····	(102)
一、“一体之治”论中的朴素整体观·····	(103)
二、对古今一贯之则的初步探讨·····	(105)
三、“法天”、“用道”的天人统一思想·····	(110)
第二节 以民为本的历史观·····	(115)
一、重民、爱民、顺民心·····	(116)
二、利民、富民、善分民·····	(118)
三、使民、教民、从民俗·····	(120)
第三节 义、利并重的价值观·····	(125)
一、时代变革的要求·····	(125)
二、重利而不轻义·····	(127)
三、树人举贤的人才价值观·····	(134)
第四章 晏婴的哲学思想	
——管学的继续和发扬·····	(140)
第一节 晏婴其人与《晏子春秋》·····	(140)
第二节 改良主义的政治思想·····	(142)
一、重礼义·····	(142)
二、省刑罚·····	(144)
三、薄赋敛、尚节俭·····	(145)
第三节 朴素唯物主义和无神论思想·····	(146)
一、天道不谄，不贰其命·····	(146)
二、祝有益也，诅亦有损·····	(148)
第四节 相反相成的辩证法思想·····	(149)
一、晏婴的“和”“同”论·····	(149)
二、晏婴的“幅”“变”论·····	(152)
三、晏婴的转化观·····	(153)

第五章 子产的改革及其哲学思想

——法家的起源……………(155)

第一节 子产的改革及其对于“礼”的态度……………(155)

第二节 子产的“礼论”及其所表现的天人一体的哲学思想……………(164)

第三节 子产的无神论思想及其不彻底性……………(172)

第四节 子产对儒家的影响及其与法家的关系……………(177)

第六章 邓析的“两可”“两然”说

——名家的起源……………(182)

第一节 邓析其人及其书……………(182)

第二节 邓析“两可”“两然”说的内容……………(188)

第三节 邓析——名家的先驱……………(194)

第七章 老聃的哲学思想

——早期道家的形成……………(197)

第一节 老聃其人及《老子》其书……………(197)

一、关于老聃的时代……………(198)

二、关于《老子》的成书问题……………(204)

第二节 “道法自然”的道体观……………(214)

一、“无为自化”的天道观……………(214)

二、“有物混成”的宇宙论……………(217)

三、道生万物的演化论……………(222)

四、“惟道是从”的规律论……………(225)

第三节 “玄鉴”“静观”的认识论……………(228)

一、“得母”“知子”的知识系统……………(228)

二、“闻道”“为学”的不同认识途径……………(230)

三、重“道”轻“学”的价值评估……………(236)

第四节 “贵柔”“守雌”的辩证法……………(238)

一、“尚弱”“主静”的辩证法系统……………(238)

二、“正言若反”的辩证否定观……………(242)

三、辩证法和认识论的一致·····	(246)
第五节 清静无为的政治论·····	(248)
一、“无为”“自化”的社会自然论·····	(248)
二、“清静”“不争”的为政之道·····	(252)
第六节 老学的历史地位·····	(255)
一、关于老学的阶级属性·····	(255)
二、老学与中国传统文化·····	(259)
三、老学与中国“国民性”·····	(263)
第八章 孔丘的哲学思想	
——初期儒家的创立·····	(269)
第一节 孔丘对春秋时期“仁”的思想的改造和发展	
·····	(270)
一、“仁”是对古代人类学的反思·····	(272)
二、“仁”是对古代人本思想的反思·····	(274)
三、“仁”是对古代重民意识的反思·····	(276)
第二节 关于仁学的哲学思想·····	(279)
一、对天命鬼神的二重心理·····	(279)
二、知、情、意一体化的认知结构·····	(284)
三、两极互补、致“中和”的方法论·····	(291)
第三节 关于仁学的伦理思想·····	(297)
一、仁学的道德规范体系·····	(297)
二、仁学的伦理施控方式·····	(303)
三、仁学的道德价值观念·····	(314)
第四节 关于仁学的政治思想·····	(319)
一、“德治”主张·····	(319)
二、“大同”社会理想·····	(324)
第五节 孔丘的历史地位·····	(327)
一、孔丘思想与政治变革·····	(327)
二、孔丘思想与民族精神·····	(330)
三、孔丘思想与文化传统·····	(332)

第九章 孙武的军事哲学

——早期兵家的产生	(336)
第一节 孙武军事哲学的产生	(336)
第二节 孙武的军事整体观	(338)
第三节 孙武的两极对立的辩证观	(345)
一、“识众寡之用”、“以众击寡”的分合原则	(347)
二、“强而避之”、“以强击弱”的战术	(348)
三、“避实击虚”的战法	(349)
四、“以治待乱”、“乱而取之”的原则	(350)
五、“守其所不攻”、“攻其所必救”的攻守策略	(351)
六、“奇正相生”、变化无穷的用兵艺术	(352)
第四节 孙武的建立在“知彼知己”基础上的认识路线	(354)
第十章 范蠡的天地人一体观和“盈缩转化”论	(363)
第一节 范蠡的天地人一体观	(364)
一、关于天、地、人一体论	(364)
二、关于阴阳、五行观	(368)
第二节 范蠡的“盈缩转化”论	(370)
一、弱可变强的政治观	(371)
二、“赢缩以为常”的军事观	(373)
三、“平巢”和“积著”的经济辩证观	(375)
第十一章 墨翟的哲学思想	
——前期墨家的创立	(379)
第一节 墨翟的政治思想	(380)
一、“尚同”的国家学说	(381)
二、“尚贤”的用人之道	(383)
三、“节用”的治国措施	(385)
第二节 墨翟的伦理思想	(388)
一、“兼爱”“交利”的道德原则	(388)
二、“义”“利”统一的评价尺度	(390)

三、注重实效的修养方法	(393)
第三节 墨翟的宗教世界观	(395)
一、“尊天”、“明鬼”的宗教神学思想	(395)
二、墨翟“非命”论的二重性	(401)
第四节 墨翟的经验主义认识论	(407)
一、对主体认知能力的反思	(408)
二、以行为本的知行观	(412)
三、取实予名的名实观	(415)
第五节 墨学的历史命运	(420)

绪 论

一、思想进程与历史发展的统一问题

哲学的基础是自己的时代，哲学思想的发展同自己时代的历史进程是同步的。哲学的时代性是由该时代知识状态造成的思维深度所决定的，因此，哲学也便成了时代精神的表现。恩格斯说：“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①要想更准确、更深入地把握哲学发展的逻辑，就必须熟悉和掌握历史运动的过程。

首先发现并提出逻辑思维同认识的历史相统一的是黑格尔。他说：“历史上的那些哲学系统的次序，与理念里的那些概念规定的逻辑推演的次序是相同的。我认为：如果我们能够对哲学史里面出现的各个系统的基本概念，完全剥掉它们的外在形态和特殊应用，我们就可以得到理念自身发展的各个不同的阶段的逻辑概念了。反之，如果掌握了逻辑的进程，我们亦可从它里面的各主要环节得到历史现象的进程。不过我们当然必须善于从历史形态所包含的内容里去认识这些纯粹概念。”^②黑格尔的这一论述是十分精辟和深刻的。他要求把历史的方法与逻辑的方法结合起来，从而达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无疑是相当精彩的。然而，黑格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22页。

^②《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第34页。

尔却把逻辑看作是绝对观念的结构，把哲学史看作是绝对观念的运动。错误地认为，不是历史为哲学的发展提供根据，而是理念的逻辑为历史的进程开辟道路，进而把历史的进程硬塞到他的绝对观念发展的逻辑图式中。这就从根本上颠倒了历史和逻辑的关系。

历史是逻辑的基础。这里所说的历史，既包括自然和社会自身发展的历史，也包括人类认识发展的历史。而所谓逻辑，则是指这些历史的过程通过逻辑的方法在概念等思维形式中的概括，是历史的东西在理论思维中的再现。因此，不是逻辑为历史提供根据，而恰恰相反，逻辑的东西是由历史的东西所决定的。

哲学史所要表明的是人类认识的历史进程，它的根本任务是显示人类认识发展的轨迹，总结人类认识的经验并进而揭示其矛盾运动的规律。

春秋时代是中国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阶段。这一阶段既不同于在它之前的西周，也不同于在它之后的战国。春秋作为特定的历史时代的名称，乃始于战国，确立于西汉。战国时人并不把自己所处的时代看作周代，而是自谓战国，他们也不把西周后至战国前的时代称为周代，而是名为春秋。如《战国策·韩策》云：“昔者，穆公一胜于韩原而霸西州，晋文公一胜城濮而定天下，此以一胜而立尊令，成功名于天下。……然而春秋用兵者，非以求立尊成名于天下也。”孟子也说：“春秋无义战。”（《孟子·尽心下》）可见，战国时人称春秋已有时代的意义。西汉时，人们继承了战国人对春秋的称谓，并进一步明确地将其作为特定历史时代的专称。《淮南子·汜论训》说：“殷变夏，周变殷，春秋变周。”把春秋直接与夏、殷、周并列。司马迁也说：“春秋之后，陪臣秉政，强国相王。”（《史记·太史公自序》）刘向则云：“及春秋时，已四五百载矣，然其余业遗烈，流而未灭。五伯之起，尊事周室。”（《战国策·序》）足见，到了汉代，春秋已经是特定的历史时代的专称了。

关于春秋时代的社会性质，我国史学界有着不同的意见。我们赞同春秋时代是由奴隶制向封建制逐步过渡的时代。因为这个时代的历史，在各个方面都表现出了过渡时期的总特点。名为《春秋》的鲁国编年历史，起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绝笔于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因此，史学家通常将周平王元年（即公元前770年）至周敬王四十四年（即公元前476年），作为春秋时期的起迄年代。

本来，春秋和战国是社会性质不同的两个时代，春秋从总体来说属于奴隶制的社会形态，而战国则属于封建制的社会形态。由于春秋战国之交是我国历史由奴隶制进入封建制的大转换时期，这个转换，就各个诸侯国来说，发展是很不平衡的。不仅各诸侯国进行封建变革的时间有先后，而且其变革的程度也有深浅的不同。因此，要用一个绝对年代来作为两个时代的分界线，是很不容易的。

在每个国家社会制度的变革过程中，代表新旧两种制度的权力的交替、新旧两个阶级之间政权的易手以及新旧两种社会生产方式的转换，是划分社会制度不同的重要标志。公元前562年鲁国季氏的“三分公室”和后来的“四分公室”，表明新兴的封建势力在鲁国开始强大起来，但鲁国的社会性质并没有发生根本的转变。春秋末期，晋国的六卿从奴隶主贵族中分化出来，转化为地主阶级的代表，并在晋国进行了一些封建性的经济改革。然而这些改革也都是在进行量的积累，尚未发生统治权力和生产方式的根本转换。与六卿分晋的同时，齐国田氏的势力也逐步强大起来。田氏代齐的过程，实际上就是齐国封建化的过程。直至公元前404年齐国的田和为相，公元前403年晋国的魏、韩、赵封侯，标志着辽阔的中原地区各诸侯国已从总体上由奴隶社会步入了封建社会的轨道，实现了新旧两个阶级之间政权的易手，确立了封建制的生产方式。在此之前各诸侯国的改革，是属于总的量变过程

中的部分变质。这种部分质变，是由各诸侯国内部发展的不均一性或不平衡性所引起的。就局部来看，封建性的改革对奴隶制来说，无疑是质变。但对奴隶社会这个整体结构来说，则不过是总的量变过程中的部分质变，尽管这种变化也显示出某些阶段性的特征，然而它却不属于根本的、全局性的质变范围。因此，我们将公元前 404 年定为春秋时代的下限，并以此作为历史的依据，来探寻春秋时代哲学思想发展的轨迹，揭示它的内在逻辑和发展规律。

中国奴隶制的生产方式，不同于希腊“古典”的奴隶制的生产方式，而是属于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式的生产方式”，即东方的奴隶制生产方式。建立在这种生产方式基础上的政权机构，是以氏族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等级宗法制。这套宗法等级制度是培育和支持奴隶制意识形态的社会基础，同时，奴隶制的意识形态又反过来起了维护和强化宗法奴隶制的作用。春秋前期，封建因素的萌芽非常微弱，各诸侯国基本上实行着从西周沿袭下来的宗法等级制。到了春秋中期和后期，新的封建制的因素在奴隶制的母腹中慢慢地发展起来，从而使思想领域也出现了一系列的变化。一些崭新的观点，冲决了传统的樊篱，从不同的领域和不同的角度奋力冲击着天命神学的堤防，动摇着它的根基，表现了人的地位的提高和理性的觉醒。各种新思想从点点滴滴，积成涓涓细流，到春秋末期，终于汇集成一股体现着封建时代精神的社会思潮，为后来战国时期的百家之学奠定了深厚的思想基础。

理论的逻辑顺序应同实际的历史顺序相符合，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条基本原则。春秋时期，旧的奴隶制的东西在瓦解，但没有最终退出历史舞台，新的封建制的东西在成长，但没有从总体上取得支配的地位，整个社会处于动荡、分化、改组的过程中。这种历史特点反映到思想领域，就是既要求思想解放摆脱传统文化的束缚，又不能和传统文化完全决裂；既要求提高人的地

位正视主体的价值，又不能和天命神学一刀两断。一些政治家和思想家，多是矛盾的复合体。封建改革的洪流，推着他们向前；而宗法奴隶制的绳索，又捆绑着他们，使其难以举步。传统与创新、开拓与限制、理性与信仰的矛盾，在同一个人身上往往都有程度不同的表现。如齐国的管仲，他倡导法制，主张革新，成为法家的先驱。但在管仲的改革措施中，含有许多旧秩序的遗传因子。他相桓公，匡天下，提出“尊王攘夷”的口号，推行霸政，使齐国成为中原霸主，维护了华夏民族的统一。然而这一切都是借用周天子的旗号进行的，所谓“挟天子以令诸侯”。管仲的法制主张，一方面冲破了周礼的某些条条框框，对周礼有所破坏；一方面又容纳了周礼的某些内容，对旧的传统有所保留，表现出浓厚的协调融合的色彩。管仲的思想给齐文化的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基础，成为后来齐法家的滥觞。齐文化在春秋战国时代形成一支别具风采的文化系统，与管仲是有重要关系的。

再如，郑国的子产“以田赋”、“作封洫”、“铸刑书”，破坏了奴隶制的井田制，冲击了上下尊卑的宗法制。但是，他对周礼仍以虔诚的态度倍加赞誉。他曾说：“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子产实行的法制和推行的改革，仍然是借用了周礼的形式而改造了它的内容。他曾以知礼著称于世，不是没有原因的。他把“天道”和“人道”区分开来，是位出色的无神论者，但在对某些问题的解释上又拖着一条宗教神学的尾巴。这种矛盾心态，与他所处的时代也是极其吻合的。

比子产晚些的老聃，主张“贵柔”、“守雌”。他的自然主义天道观和清静无为的政治论，既是对西周以来传统宗教神学的声讨，也是对当时以周礼为指导原则的政治思想的否定。但是，他的哲学思想明显地充满矛盾，他打倒了上帝，认为“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但又甩不掉“天志”论的影子，认为天道对待

善人和恶人态度不一；他否定了鬼神的作用，但又不取消鬼神的存在；他宣扬“静观玄鉴”，主张“不行而知”，但又要人们“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他抨击仁义忠孝，但又提出“大道废有仁义”，“国家昏乱有忠臣”。总之，他的思想明显地带有旧贵族烙印。

曾经向老聃“问礼”的孔丘，代表了由奴隶主转化来的地主阶级的利益，一方面和旧的宗法奴隶制藕断丝连，对春秋时期的社会动荡和分化改组十分不安；一方面又要向新兴的社会力量谋求妥协。他宣扬人的“仁德”，用“仁”来补充“礼”，修正“礼”，企图实现他的“德治”主张，使天下归于“有道”。他的政治思想带有浓厚的改良主义色彩。在世界观上，他宣扬生而知之的先验论，但又不排斥学而知之的经验论；他尊重理性，“不语怪力乱神”，但又不放弃信仰，说什么“祭神如神在”；他鼓吹天命论，认为理智的目标是“知天命”，但又主张积极从事，甚至提出“知其不可而为之”。这种对“天命”、“鬼神”所表现出的二重心理，也是社会的新旧矛盾在孔丘身上的特殊表现。

墨翟则不同，他代表“农与工肆之人”，主张兼爱、非攻、尚贤、尚同，抨击“伤生害事”的礼制，“背周道而用夏政”，是手工业者和小生产者的思想代表。但是，他的“天志”、“明鬼”观念犹如一根粗大的绳索，紧紧地捆绑了自己的手脚，使他无力挣脱传统的天神观念的束缚。墨翟思想中的这种矛盾，不能到别处去寻找，它也不过是当时的社会矛盾、历史进程在抽象的、理论思维形式上的反映罢了。

列宁说：“在逻辑中思想史应当和思维规律相吻合。”^①又说：“要继承黑格尔和马克思的事业，就应当辩证地研究人类思想、科学和技术的历史。”^②如何辩证地研究人类思想的发展史，这

^①列宁：《哲学笔记》第355页。

^②同上第154页。